

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论战

小月译编

美国哈佛大学的杨大清在《中日研究》第三卷第一期（1990年1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南京暴行史实的中日论战》文章，叙述了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南京大屠杀问题的不同意见，今将其要点摘译并作补充。

一 日本关于南京屠杀事件争论的由来

“南京暴行”事件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最臭名昭著的日军暴行，在近十几年里，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事件，在中日两国又重新成为热门话题。仅在日本，作为十分激烈的争论，就出现了许多书籍和大量报刊文章。不但一部分学术界人士卷了进来，而且广大群众也极为关注，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这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社会事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也有所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37年的日军暴行除在宣传媒介中揭露外，还登上了银幕，并且建立无数纪念碑，包括一座宏大的综合性纪念馆。

世界第一次得知南京日军暴行，始于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的报道，那是日军占领南京的第5天。该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在日军占领南京3天后离开那里。他从上海发出几则电讯，报道了日军的“整个暴行和野蛮行径”。与此同时，留在南京组织难民救济工作的一些外国人在给上海友人的信件中，也描述了日本士兵的猖狂劫掠、强奸和屠杀。《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员田伯烈1938年撰写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恐怖在中国》一书，收录了若干这类信件，严厉谴责日军的兽行。这本书在伦敦和纽约发行，有中译本。战时许多中国报刊杂志登载的日军暴行

情况，都是从沦陷后的南京逃出来的人讲述的可怕经历。尽管还不知道遇难者的确切数字，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已震惊了世界，令人发指。

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合作下，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调查，提出大量有关屠杀的资料，包括中国和外国目击者的陈述，当时的报刊报道，损害调查机构以及南京殡葬组织的统计记录。1946年，4名日军军官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犯有组织南京暴行罪被判处死刑。两年后，暴行发生时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其他6名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关于日军暴行的程度，南京和东京的军事法庭一致估计，约有两万起强奸案和全部建筑物的三分之一被毁，但对死亡人数则有稍为不同的判断。东京法庭估计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有20万以上，而南京法庭则说有30万以上。后来的审讯中甚至出现更高的数字：43万。

如此残酷的暴行，中国人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他们把最近的过去看作是一个在外国侵略者控制下饱受苦难和屈辱的世纪。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访问调查了许多暴行下的幸存者，并于两年后完成了八章的书稿，其中有新搜集的日军屠杀、强奸、劫掠和破坏的统计数字。嗣后，他们还为来访的日本代表团举办了报告会和图片展览，并向日本学者提供了这方面的研究资料。

在日本方面，由于战时对新闻界的管制，在东京审判以前，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南京暴行之事。在其后20年间，南京屠杀的情况作为战争回忆录的部分情节，不断在出版物中出现。以前在华的新闻记者和士兵在撰写回忆录时，一般都肯定南京暴行的存在。在1957年《文艺春秋》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一位前《朝日新闻》的通讯员回忆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听到持续不断的机关枪声，一位军官告诉他，大约两万名中国战俘被枪杀了。

60年代，许多日本人访问中国，由于中国主人的介绍或参观

展览，回来时都对日军的战时暴行进行了回忆。1965年，日本遣返者协会发表了一份参观“万人坑”的报告，南京暴行开始受到注意。新岛淳良于1967年访问南京之后，在几个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大屠杀的文章。1966年访问南京的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在后来的辩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访问的结果，他于翌年出版了《近代战史之谜》一书，其中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一章题为“南京事件”。他对当时为“大东亚战争”进行辩护之风甚为不安。关于南京日军暴行，他写道：

这是为了给反省提供资料，重新唤起对中国人民的歉疚之情，并且澄清南京事件的事实。那是军阀对国家的错误领导造成的。

洞富雄利用大量东京战犯审判的文件、当时在华外国人的报道以及战后日本出版的战争回忆录，系统地研究了日军对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的屠杀和对中国平民的种种暴行。虽然他不同意43万这个数字，但基本同意30万这个数字。他认为，日军高级军官应对屠杀负责，整个日本军事体系应为施于平民的暴行受到谴责。

60年代后期，日本还很少关于日军在华暴行的报道，直到1971年这个“新闻出版的禁忌”才被打破。这应归功于本多胜一。本多胜一是一位获波恩国际记者奖的多产作家，以报道和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而闻名。本多说，关于日军暴行还从未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人难以理解中国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关切。1971年本多在中国作了一次40天的旅行，访问了许多日军暴行的地点，搜集了许多目击者的陈述和其他证据。返回日本后，他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并收入他的《中国之行》一书中。

本多引用了死难30万人的数字，也许比那些数字更令日本读者烦恼的，是同时发表的那些被残杀的中国受害者的尸体和割下的人头的照片。同样使日本读者不安的，是那些中国幸存者关于日

军暴行的令人发指的回忆。本多发表在日本第一流报纸上的报道和他的书，很快就引起全国的注意。几乎在同时，洞富雄把他《近代战史之谜》一书中的那一章，扩充为一本十分完善的书，名为《南京事件》。稍后，经他编辑，作为关于中日战争系列原始资料的一部分，出版了两卷有关南京事件的文件。其中包括东京审判南京暴行问题的正式文本，以及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外国报道的译文。多亏这位受欢迎的作家和这位知名历史学家的努力，才使这个已被遗忘的南京事件重新显露出来。本多的系列文章发表后仅几个月，《文艺春秋》社发行的《诸君》杂志，在1972年4月号刊载了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的幻象》的文章，接着在之后的几期中又刊登了更多的相关论述，并在一年后编辑成书发行。这些文章的作者铃木明，对洞富雄和本多胜一所揭示的南京屠杀的大多数证据加以驳斥，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更大注意。

对铃木的著述，洞富雄立即作出了反应，他在一家历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随后，他将这些文章编纂成书，名为《南京大屠杀：对图谋将其变成一种“幻象”的批判》，由当代历史出版协会出版发行。

70年代中期，这一辩论开始热烈起来。评论家山本七平出来为铃木辩护，也在《诸君》上发表文章驳斥南京屠杀的可能性。山本其实就是《日本人与犹太人》一书的作者——那位自诩犹太问题专家的神秘的以赛亚·卜一达山。这时，本多和洞联合起来与卜一达山进行了几个回合的公开信辩论。反对一方没有足以和洞富雄相比的全面研究，所以辩论没有持续很久。肯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方虽然占了上风，但是对反对的一方还没有完全驳倒。

二 日本修改教科书引起的反响

1982年7月末，日本四家主要的全国性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

道，文部省已强行修改高等学校教科书。这一新的事件几天内就升级为外交危机，中国和韩国政府就日本文部省企图撤销对过去侵略的承认一事提出了正式抗议。由此，关于战争的问题，再次成为日本全国关注的中心。

教科书修改中最主要的争论点是，把1945年前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表述成“进攻”，甚或改为中性词“进出”。对教科书修改南京暴行史实，也同样引起争论。教科书作者历史学家永三郎对文部省提出三次诉讼，控告它修改教科书违宪。他控诉的三个案件之一就是关于南京暴行的叙述。例如，有一本教科书描述这一事件是用如下词句：

在占领南京时，日本军队杀死了大量中国士兵和平民，进行袭击、抢掠和焚烧，并因南京大屠杀而受到世界的谴责。据说中国受害者达20万人。

经文部省修改之后，这段文字成为：

在进攻南京的混乱中，日本军队杀死了大量中国士兵和平民，并因南京屠杀而受到世界的谴责。

另一本教科书原本叙述说：

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屠杀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并受到国际上的指责。

修改后的课文加上了一段解释：

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日军蒙受重大损失。因此，日本军队在攻占南京时屠杀了大量中国士兵和平民，并由此受到国际上的指责。

在新闻出版界看来，日本政府这样的修改，很明显是在尽量缩小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并为之辩护。虽然这里的争论常常

只不过是教科书脚注的几行字，高校学生们对之可能一点也不注意，但是关于南京屠杀的辩论，很快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教科书论战之后仅几个月，洞富雄就出版了他的《权威版，南京大屠杀》，为修订和加强其原有结论再次作了努力。本多作为新闻记者，又一次访问中国。这次他是沿着1937年日军进攻的路线考察。他写的《通向南京之路》在1984年的《朝日新闻》上连载，文中披露了日军在上海和南京期间更多的暴行情况。尤其重要的是，同年成立了一个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该会的研究成果，是一些关于南京暴行的专题论文和中国著作的译本。

但是，教科书论战也触动了另外一些日本人。田中正明以反对所谓“东京审判历史观”的斗士面貌出现，当1984年教科书又恢复其原本课文时，他和另外6人在东京地方法院对文部省提出了控诉。与此同时，《产经新闻》要求以前南京战役的参加者给田中写信，提供证言。利用松井将军阵中日记和所谓证言，田中于1984年出版了《南京屠杀之虚构》一书。

在关于南京事件的激烈争论中，洞和本多的支持者们，被称为“屠杀派”。作为他们的论坛，《朝日新闻》和有关杂志时常发行关于南京暴行的专刊。另一方面，铃木、田中和他们的支持者则被称作“幻象派”，他们是《文艺春秋》及其分支《诸君》和《正论》的撰稿人。双方都把关于南京暴行的争论，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行动性质的两种针锋相对见解的焦点，并把论战看作是对当前中日关系之态度的实验场。“屠杀派”看重于那次战争的侵略性质；而“幻象派”则想看到东京审判受到明确的公开指责。前者强调整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为日军罪行认错的重要性；而后者则把前者强调的这些行为称为投降。

在教科书论战的余波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的联谊组织偕行社向其18000名会员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他们提出足以否定南京暴行的现场记述。这是根据一位南京战役的参加者，战后担任日本国防大学教官的南本正己的建议进行的。一个“幻象

派”的成员，把在南京非法杀害的中国人估计为3000至6000人。亩本把会员们的来信编辑成一套包括11个部分的专辑，名为《基于证言的南京战役史》。据说，文部省的一位官员认为，这个成果可以用在未来的教科书修订中，以否定洞富雄的意见。

但与偕行社的期望相反，许多会员提出了肯定那次屠杀的证言。其中有一位以前在松井手下的军官，估计大约有12万俘虏在一位参谋官的命令下被杀。仅这一证词就足以使否定暴行的整个图谋流产。在专辑的结尾部分，偕行社杂志的另一位编辑写道：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不可原谅的非法处死，作为和旧日本陆军有关的一员，我应该向中国人民深致歉意。”

1985年接近年底，这次争论过程中最引人瞩目的丑闻出现了。一家很受欢迎的历史杂志《历史人物》发现，新出版的松井阵中日记有多达九百处的错误。虽然有些是小错，但其余的则很明显，是有意的更改，以否定南京日军暴行的实际存在。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窜改的制造者，正是批评弄虚做假的田中证明自己。对如此明目张胆地伪造重要原始资料，多数人极为震惊。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伪造了文件。1989年，中岛今朝吾将军的战时日记“如实地”在《历史人物》上发表了。中岛曾指挥第六师团攻占南京。他的日记提到“政策是一般的不收俘虏”，还提到寻找大的壕沟，以便处死七八千俘虏的事情。在一个地方，他曾亲眼看着一名日军刽子手砍下两个战俘的头。作为当时在场的日军最高司令官之一的记述，这是关于南京有组织暴行的最为重要的证据之一。与此同时，这种记载又被许多以前的普通士兵所证实。

在争论十多年以后，虽然大多数人承认，不论或大或小，南京屠杀确曾在1937年末发生。但这些记述并未使“幻象派”信服，他们仍在力图驳倒“屠杀派”学者们的论据，并且不是没有成果；而后者则揭露过去鲜为人知的其他日军在华暴行，并且作了更多的说明。争论在继续着，而且双方都有青年成员参加。被

害中国人的确切数字，仍是一个有待解开之谜。

即使在教科书论战前，中国人也并非不知道日本人70年代关于南京暴行的争论。不过，直到1982年，中国人才开始比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关于日本修改教科书的报道传到中国后，南京事件以及日本人战时在中国的其它暴行，重新成为中国报刊的热门话题。对8月中旬日本投降若干周年的纪念，各主要报纸刊登了类似“历史岂容篡改？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纪实”那样标题的文章。1937年大屠杀的幸存者在报纸和电视上重又详细诉说了他们的惨痛经历。1982年8月12日，中国公开展出“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展览”，展品中有许多照片及一些保存完好的日军刺刀和机关枪。中国的历史学家再次克尽职责，在历史杂志刊登内容详尽的专题论文。他们引用了过去在中国很少提到的南京和东京两地审判的判决，也引证中国目击者的叙述和当时的外国报道，有些作者还引用日本的原始资料。

198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40周年，中国又一次掀起了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出版和纪念活动高潮。最令人注目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落成典礼。在这座现代化的综合纪念馆中，除有大批照片外，还有死难者的尸骨，据说这些尸骨是在建筑施工中挖掘出来的，而寓意最深的则是正面墙上用中文、英文和日文镌刻的字：“遇难者300000”。这是中国官方估计被日军杀害的人数。同时，在南京全城十几处日军进行屠杀的地点，都建起较小但同样引人注目的纪念碑，纪念遇难的中国人。由知名书法家书写的碑文，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碑文写道：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残杀了我们的同胞三十万人。在这附近被杀害的有二千人之多。这个纪念碑的建立是为了让后代永志不忘，并下定决心，增强国力，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其后不久，《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其中引用了口述历史和外

文资料。南京暴行也成功地搬上了银幕，福建和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屠城血证》，于1988年首次上映。

在史学方面，1985年中国也出现了研究南京暴行的新局面。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出版了《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一书。这本书根据中、英、日文的原始资料详尽地作了注释，叙述极为公正。这本书连同作者的其它文章代表了中国在这一课题上的最优秀研究成果。高教授最后出版了南京暴行史稿。更加鼓舞人心的是对原始文件和目击者陈述的汇编出版。这次全市范围的调查，尽管并不全面，但已找到了1756个日军暴行的见证人，其中的176人是死里逃生者，至今他们的身上仍留有明显的伤疤。见证人还有亲属被杀害的514人，被日本侵略军强奸的妇女44人。他们的许多证词连同当年中英文报道和英文资料的译文，一起汇编出版。

关于南京日军暴行的疯狂程度，能代表中国最新学术成果的“史稿”中，仍把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死亡总数定为30万人以上。大多数中国作者都认为，大屠杀是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日军高级将领在进攻南京前就策划好了的。一位中国新作者总结说：“日本军国主义应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洞富雄和他的同事们博得中国学者的广泛赞扬。

对日本人否认南京暴行的警觉，并不仅限于在中国大陆，台湾学者也以同样的精力议论这一问题。如李云汉就有关南京日军暴行著作撰写了一篇篇幅很长的全面评述，而另一位学者李恩涵则发表了几篇关于日军在华暴行的论文，其中包括关于事件责任问题和南京暴行死亡人数的评论。编纂国民党党史的台湾官方委员会出版的《革命文献》，其中两卷就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大陆关于这方面的书已在台湾再版，而且，反过来也是一样。

三 驳斥石原慎太郎的谎言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于1989年2月20日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发言说，日本出版了《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卢沟桥事变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一书，书中所载日本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远山茂树教授对会议的总结称：

“这次讨论对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中日全面战争的意见更加明确了。这个意见的核心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对于这一点，讨论会没有任何的暧昧。”既然如此，刘大年质问道：“在战争性质问题上往后倒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其实，这并非空穴来风。不久后，日本众议员、前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杂志《花花公子》（1990年10月号）上发表谈话，公然说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对于这种胡言呓语，中国《人民日报》于1990年10月14日发表了冬明题为《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的文章，加以驳斥。但这位日本议员竟置若罔闻，于11月10日又对共同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不认为发生过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把没有的说成有，这不是谎言吗？”他还说：“请去问问自民党的政治家看，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有过‘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他还表示，关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已经详细地写在他不久前抛出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在那本书中，石原还明目张胆地鼓吹什么日本人应该“肃清战后意识”，修改宪法。

对石原这种妄图一手遮日的弥天大谎，冬明的文章驳斥说：“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开始了长达6周的烧杀淫掠。其屠刀所向，山河血染，日月失色。据不完全统计，在那场大屠杀中，集体射杀并毁尸灭迹的达19万人，零散屠杀并经慈善团体掩埋的达15万人，合计30余万人之众。”文章还说：“当年参与指挥大屠杀的主凶刽子手谷寿夫，在他被处刑前，尚希望以他的死消弭些许中国人民对日寇的仇恨，许多当年犯下屠杀

中国人民罪行的原侵华军人尚知悔罪自责，站到赎罪的行列，而身为国会议员的石原先生却连发生过大屠杀都不肯承认，其良知何在？”“他的这种奇谈怪论，看来决非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别有用心地捏造谎言。”

石原这种否认日本过去侵略罪行的谬论，在旅美华侨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威、纽约州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唐德刚等人于11月9日发表致石原的公开信，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蒙受到日本的侵略和侮辱。在两国关系好不容易实现了正常化的这一时期，石原不仅不正视历史事实，而且还利用美国舆论，向全世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这种态度是不能容忍的。”

1990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日报》以显著地位发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益锦题为《南京大屠杀史实不容否认》的文章，针对石原的谎言，以大量史实痛予驳斥。《人民日报》同时发的编者按说：“我们要告诉石原先生，不是别人把没有的说成有，而是你自己把有的说成没有。究竟是谁在说谎，大概连日本的大多数有识之士也是心里有数的。”“重述世人皆知的事实，并不是为了说服石原慎太郎一类人，而是为了：第一，提醒人们注意，有人在否定历史事实；第二，请人们思索，象石原慎太郎这样的政界人士，为什么要撒谎。”针对石原说的“如果真有那种破天荒的（大屠杀这种）事情，当时的外国随军记者为何没有报道呢？”张益锦的文章指出：“当时在日军攻城战和以后的大屠杀中，日本战地记者都作了报道。如《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等就报道了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岩进行的屠杀中国人比赛。该报分别以‘百人斩大战’、‘百人斩超纪录’为题予以刊载，并刊登了向井和野田的照片，称他们为‘皇军’的‘英雄’。当时在东京出版的英文版《日本报知者》也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所谓‘战绩’。为了防止日军暴行流传于世，日本当局曾限制刊登南京大屠杀的

文章。前坂俊之根据《出版警察报》统计，被禁的有关文章仅1938年头3个月就达182篇。不仅日本记者，当时在华的美国《纽约时报》、《生活》杂志以及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等报刊记者也据实发表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照片。”张益锦还引证1984年8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在日本宫崎县杵北乡村一农家，发现了一本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都城二十三团一名上等兵的日记，该日记写道：“（日军）把无辜的支那人抓来，或活埋，或推入火中，或用木棒打死，或采用其他残酷手段加以杀害”；“今天，我们又把无辜的中国人推倒，猛打到半死状态时，又把他们推到壕沟，从头上点火，把他们折磨死。”此外，当时攻占南京的日军工兵外贺关次的日记、被称为屠夫的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关于攻占南京的“军状报告”、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少将旅团长佐佐木的作战记录《南京攻略》、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三旅团少将旅团长山田的记录，都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日本陆续仍有发现。《朝日新闻》晚刊1991年2月15日刊登本多胜一题为《南京大屠杀新资料》的文章披露，日本福岛县小野贤二发现了曾参加攻占南京的一名日本军官所写的20册日记，其中记载，当年在“幕府山麓长江岸边处分（即屠杀）”的俘虏数为17025人。枪杀这些人用了两天时间（即12月16日和17日），“按照军部的命令，由第一大队枪决”。文章说，象这样有关的宝贵资料，在日本各地还有许多。

中国《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刊载的文章和10篇史料，对南京大屠杀提出了新的证据和有力论证。高兴祖孙宅巍的文章，从有关日军暴行的报道、30万人被屠杀的证据、尸体的掩埋和处理、日军暴行的原因和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刘燕军的文章中，论证了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主要的策划者之一。日本宇都宫大学笠原十九司教授对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残暴行为作了分析。该刊所载德国档案馆中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

披露了原民主德国中央档案馆（现德国联邦档案馆波茨坦分馆）保存的当年德国驻华使馆记载的有关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发生的‘残暴行径’的真实记录”。在这些档案材料（原件长达190多页）中，当时留守南京的德国外交官罗森、纳粹党负责人拉贝、英国记者史密斯和美国牧师马吉，以他们耳闻目睹的情况，详细、清楚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

1991年8月2日，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宣布，他们发现了一部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中国人民的记录片。这个记录片是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由他的次子，退休的投资银行家马大卫提供出来的。从影片可以看到被日军刀劈半边头颅的中国百姓，后颈被军刀砍而未断的男子，遭日军蹂躏的幼女，被日军杀后又用刺刀戳穿身体的幼婴以及池塘中浮满的尸体等惨状。马大卫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父亲于1937年底到1938年初将胶片秘密带出中国，随后把胶片复制4套，一套带回美国，一套在日本放映后不知所终，另一套下落不明。最后一套交给当时的德国外交官罗森，1990年在原民主德国档案馆中被发现。在1991年早些时候，一位美国老太太已提供了一部由当时在南京圣公会传教的马吉牧师拍摄的类似的日军暴行实况纪录片。这两部记录片以真实具体的形象，揭露了当年日军灭绝人性的罪行。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罪行铁证如山，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日本竟有那么一些人，如石原慎太郎、铃木明、田中正明之流，仍在挖空心思地歪曲历史，妄图勾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他们显然包藏不可告人的祸心，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招魂！对这种逆转历史的罪恶活动，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以及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和世界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作者单位：天津市政协编译中心）